

献给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建院 10 周年

| 目 录 |

总 序	1
自 序	1
 第一编 对翻译学性质的学科学思考	1
对翻译学构建中几个问题的思考	2
从学科学的角度谈翻译学的建立	14
翻译学——传播学的一个特殊领域	26
普遍语用学的翻译观 ——一种交往理论的翻译观	38
 第二编 对翻译学研究的哲学思考	51
哲学的语言论转向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52
翻译学应从解构主义那里学些什么 ——对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我国译学研究的反思	63
理论哲学向实践哲学的转向对翻译研究的指导意义	76
价值哲学与翻译批评学	93
 第三编 翻译学的范式研究	109
结构·解构·建构 ——我国翻译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110

范式批评与问题意识	
——对译学研究的两种路径的批评研究	120
论学派与建构主义翻译学	139
第四编 建构主义翻译学研究	157
何为建构主义翻译学	158
翻译学构建中的哲学基础	176
建构的翻译学之认识论基础	189
建构的翻译学之理性基础	203
共识性真理与建构的翻译学	
——论建构的翻译学之真理观	214
建构翻译学的语言学基础	230
第五编 翻译批评学研究	243
翻译批评的危机与翻译批评学的孕育	244
对翻译批评标准的价值学思考	257
翻译标准的多元性与评价的客观性	
——价值学视域下翻译批评标准问题的探讨	272
后 记	288

| 总 序 |

去年末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张杰院长向我谈及他和同事们正在筹划出版一套博士生导师的文库,作为对该院院庆十周年的献礼,顺便邀请我为该书写个总序。我当时只考虑到多年朋友,盛情难却,便贸然答应了。如今我拿到全部书稿目录并拜读文集作者的前言后,才发现文集所涉及的学科面又广又深,远远超过自己所知,自愧“墙上芦苇根底浅”,不宜担当如此重任。对我来说,应该认真学习,日后交份读书报告才是。但临阵脱逃,为时已晚,现只能匆忙上阵,谈谈自己的一些感受。

感受一:列入本文库的作者有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九位博士生导师,从学科搭配、梯队建设、科研成果来看都是令人满意的。自我国 20 世纪 80 年代初设立博士点后,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博士点时有增加,还有些高校正在申请中。对这些博士点,老的、新的、未来的,如何评价?教育部蛮可派遣评估小组驻点调查。其实,不派钦差大臣而是从民间了解一下某校的博士点情况,也可知悉其一二。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库的出版是对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这几年工作的最好检阅。但我想得更远,近年来国内外大谈中国的崛起,这往往是以 GDP 为参照的。其实,物质文明的发展离不开精神文明的发展,也必作用于精神文明的发展。本文库的问世从一个侧面,哪怕是很微小的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高校中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发展。

感受二：正如上面谈到的，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科研力量中，有文学方向，有语言学方向，有应用语言学方向，有翻译学方向，等等。过去有些学校强调本专业文学研究如何强盛，或语言学队伍如何壮大，或外语教学水平如何高，均失之片面。作为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两条腿走路总比一条腿强。对教师来说，行行出状元，条条道路通罗马，只要持之以恒，都能做出成绩，因此，只有摆脱无形的和人为的比拼和学科的相互排斥，才能迈开大步往前走。在这个问题上，张杰教授和辛斌教授两位领导能团结同仁，摆正方向，教学科研一把抓，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我们呼唤和期待国内外语院校中出现更多的具有雄心壮志、视野开阔的领军人物。

感受三：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各位导师在科研中所走过的道路对我们颇有启示。例如，张杰教授擅长研究方法、俄苏文论和欧美文学；辛斌教授先后研究语义学、语用学、系统功能语言学、批判语篇分析；姚君伟教授研究现当代美国作家赛珍珠和桑塔格；钱满素教授自英美文学转向美国历史和思想史，特别是美国当代社会思想；研究翻译学的吕俊教授从结构主义走向解构主义，又从解构主义走向建构主义；傅俊教授除英美文学外，填补了加拿大文学和文化的空白；马广惠教授对二语习得和相应的对比修辞、词汇教学和文体学情有独钟；倪传斌教授自述他的学术侧重点经历了四次变化，如从医学英语翻译实践转到翻译技巧研究，从翻译技巧研究转到外语教学研究，从外语教学研究转到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最后从对外汉语教学研究转到学科前沿的神经认知语言学研究；黄和斌教授坚守语法学的阵地，但能结合当代认知语法学的动向。所有这些表明，我们的学者们是经历过多次转型而成长的；所有这些也表明，不同学科实际上是互相关联的，对一个新



的学科的掌握,有助于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发现新的切入点。用时兴的认知科学的话来说,在大脑中建立更多的知识模块的链接点,经过相互作用和激发,产生创新思维。因此,本文库的出版不仅是为院庆十周年献礼,或者为各位学者建立科研档案,更是通过文库与读者相互交流如何治学的经验,从而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感受四:在我国高校中,经常出现科研与教学的矛盾,在科研上做得较好的,有时对教学不够热心;在教学上非常认真的,有时在科研上不够突出。在这方面,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导师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如傅俊教授注意在教学中与时俱进,获得学校的“教师育人奖”;马广惠教授将二语习得理论运用于修辞教学和写作教学;黄和斌教授的经验是先在英语教学与阅读中发现问题,然后查阅资料,再解决问题,完成科研。他又将部分科研成果应用于教学中,“草根味”十足。可见,科研与教学是可以互补的、融合的,关键在于合理安排时间,妥善处理各种矛盾。

感受五:从九位博士生导师的发展轨迹来看,有三位是改革开放前受的高等教育(其中一位即将进入退休之列),其余均在改革开放之后得到培养。前者如果不是改革开放,也许会虚度此生,错过人生和学术的第二个春天;后者之所以能在国内外受到良好教育,更应归功于改革开放政策,国家对教育的重视并提供必要的进修、工作和科研条件。钱满素教授从研究文学转而着眼于探索社会本身,不是没有道理的。所幸,一当机会来临之际,不论是前者或是后者,都抓住了这个机会。这就取决于各位导师的事业心,而这又取决于他们个人对生活的追求、个人对社会变化进程和未来的理解和信心。

感受六:当我们畅谈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所取得的成就时,我不禁与傅俊教授一样,缅怀原系主任桂扬清先生和郝



振益先生(已故)。我有机会与桂扬清先生于1980年代中期共同参加教育部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的工作,从前辈的文学修养和处事稳重中受益良多;我也应郝振益先生多次邀请来南京师范大学讲学和参加各种学术科研活动,他的学问和人品从此成为我的楷模。可以说,两位前辈和外语学院其他资深教师的勤奋耕耘和朴实学风,对教学科研的无比重视,对中青年教师的积极培养,与兄弟院校的团结和谐,为今天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搭起了腾飞的平台。

教学与科研并重,传承与革新共存!与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全体教师共勉。

胡壮麟

北京大学蓝旗营

2007年7月15日

| 自 序 |

本文集是我从近十年(1996年后)发表过的几十篇论文中筛选出来的,而且其中大部分文章又集中在2000年以后几年的作品上。虽然我从1983年开始就在《中国翻译》(时称《翻译通讯》)、《现代外语》、《外语学刊》等刊物上发表文章,但是因为那时的几十篇文章内容比较分散,缺乏系统性,在理论深度上也有欠缺,所以,我仅把关注点放在了近十年上。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国译学界的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原来具体而分散的问题讨论转变为作为独立学科的系统研究,其间发生过关于翻译研究是否是一个独立学科的大讨论,有过各种理论的交锋与争鸣,有各种流派与范式的争辩与讨论,等等。这些讨论不仅扩大了译学研究的领域,也加深了对翻译活动的本质性认识,并使研究者的理论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我身处其中,这对我个人也是极大的促进。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开始想系统地解决几个问题以对译学发展竭尽绵薄之力,当时虽然我国关于译学的独立性问题的争论尚未充分展开,但已是风云初起。我认为讨论这一问题并不是凭主观看法或直观感觉的,必须从学科学的理论中去寻找答案。于是我对学科学进行了研究,从中找到学科学关于什么才是一个独立学科的科学定义,并对一个学科从创生到发展应遵循怎样的规律和经过怎样的时间阶梯,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主干学科与分支学科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有所认识。在当时的译



界,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的研究还占着主导地位,但人们已经感到了这种范式的封闭性与静止性等不足之处,而苦于还没有寻到一条出路,并在两三年中,译学研究陷入低谷(有人称之为沉寂期),我也曾尽力想为翻译学寻找一个机体框架,为翻译研究构建一个包括翻译活动各种要素的框架理论。我认为翻译活动在实质上也是一种传播(communication)活动,只是有着不同于一般传播活动的特殊性,即跨文化性与语际性,所以又撰写了相关的文章并出版了以这种理论为框架的教程——“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系列教材之《英汉翻译教程》”(2001)。在完成这项工作之后,我又着手分析我国译学所走过的道路,看一看在译学发展的形势下面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内部原因与规律,因此,我又用库恩的科学哲学的理论分析了这问题,终于发现从传统语文学范式的研究到结构主义语言学式的研究及接踵而至的解构主义多元式研究转变,实际上是一种范式的嬗替,而范式的革命是一种格式塔式的转换,即从译学认识论观、哲学基础、真理观与理性观和语言观均发生了整体转换,从而完成了译学范式的划分。这一研究集中反映在《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一书中。自2001年起,我开始了对建构主义翻译学的思考。经历了四年的努力,我完成了建构主义翻译学的论证,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最终以《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一书宣告这一阶段的结束。这条路,是前人没有走过的,所以走起来感到十分艰难,但作为研究者的满足感也正是从这种开创性的工作中获得的。

在完成建构主义翻译学的任务之后,我又根据翻译学的学科结构中关于翻译批评学的空缺,开始思考翻译批评学的问题。以往的翻译批评是实践指向的,是对翻译字句与具体翻译现象为对



象的,那么,我们又是根据什么来判定翻译批评标准的呢?为什么以往的翻译标准会一个接一个地被否定呢?我认识到原因在于以往的翻译标准是根据某个翻译理论推衍出来的,它们之间做的是一种循环论证,所以一旦该翻译理论受到质疑和批判,那个翻译批评标准也就随之失效,而翻译批评的任务又绝不是说明一部译作是否与原文字句的相同,而很重要的是说明一部译作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知识价值、审美价值和道德价值。一句话,对人的解放与社会进步有何贡献。翻译批评是一种价值评估与判断,它体现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所以,翻译批评的标准实际上是应以价值哲学为基础的评价理论为指导的。翻译批评学实际上是对翻译批评的批评,是对翻译理论研究的指导,而以往这方面几乎是空白的。近两年来我又从这方面着手研究,并已写出十几篇专题论文。但因该文集字数有限制,只能选择其中的四五篇论文,以飨读者。

虽然从事译学研究二十余年,但成就甚微,我常归咎于缺少名师指点,所以很羡慕今天的青年学子有机会考博或出国留学,择名校名师而从之,数年间便得真传,成就事业。而我却一直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因有感于此,尝写过一首小诗:“常羡他人有名师,雁雀同飞共一时。我独学翹荆棘里,误入歧途尚不知。”但事有两端,这种自学自悟也锻炼了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我不习惯于跟风尚赶时髦,有自己的路好走。近十一二年中也真摸索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还是可以聊以自慰的。

这本文集的二十几篇文章大体上反映了我这十余年来对译学研究的主要思想。因本人才疏学浅、孤陋寡闻,如有不当或谬误,真诚希望广大译界同仁批评指正,以共同促进译学研究的发展,繁荣我国学术事业。





第一编

对翻译学性质的学科学思考

对翻译学构建中几个问题的思考

一、概念的廓清与学科学理论的学习

翻译学是不是科学？它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如果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其学科性质和归属情况又如何？这些问题是目前翻译理论界争论的几个焦点问题。要回答上述问题，首先要弄清几个概念，并要学习一些相关的理论。以往的讨论常常纠缠不清，其原因之一就是概念不清，其结果是各言其是，却没有对有争议的问题聚焦。其二是缺乏相应理论的指导，其结果是讨论难以深化，常出现理论上的常识性错误，甚至带有情绪化的倾向。往往就某个基本问题反复争论，令人生厌，许多读者都表示不愿意再读这类文章了。我希望中国译协和《中国翻译》编辑部专门组织的这次讨论会，一定要避免上述倾向，要引导讨论的深入，倡导理论学习的风气。

首先是明确概念的问题。

要讨论翻译研究是不是科学，首先是明确什么是“科学”这一概念。对于这一概念在历史和现实社会中都有着不同的理解，也可以分广义的理解与狭义的理解两种。广义的科学概念是指关于事物的本质属性及其规律的知识，以及获得这些知识的方法。而狭义的科学概念是指那些具有高度逻辑严密性的实证知识体系。它强调严密的逻辑性，甚至可以公理化，或用数字模式来表示，并能直接接受观察和实验检验。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接受广

义的科学概念的。一些国际组织都接受广义的概念,并把人类的普遍知识分为三大类别: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但也有些国家(如英国和美国)只接受狭义的科学概念,他们认为只有自然科学才可以称之为科学,社会科学可以勉强算作科学,因为自然科学中的一些研究方法还可以适用于这方面的研究,而人文方面的知识只可以算作学科,不可以算作科学,所以他们称之为“人文学”。他们的分类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德国是接受广义概念的代表,他们认为人文知识也是科学,称之为精神科学(或文化科学)。他们仅把人类知识分为两类,即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精神科学包括人文与社会这两方面内容,因为这两方面知识有着许多共同的特点,即都是对包括人的精神在内的客体进行研究的。这一点也为其他一些国家和学者所接受,并被统称为人文社会科学。

而从历史上看,人文科学比自然科学有着更悠久的历史 and 传统。它是先于自然科学出现的,是欧洲思想界经过漫长的中世纪神学统治之后一次人类觉醒的产物,是向神学挑战并站在它的对立面提出来的。它是人类认识自身和世界的一大成果,在人类科学史上占有光荣的一席。16 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就对近代科学做了如下的划分:记忆科学(如历史等)、想象科学(如诗歌、艺术等)和理性判断科学(如哲学等)。他的划分就是根据人类自身的几种能力来划分的,即记忆力、想象力和理性能力。这充分体现了人文精神。我国早初所使用的也是广义的科学概念,但最初我国没有科学这样的字样,我国将通过对事物进行分类辨别、认识和研究叫做“格物致知”,即通过这样的方法获得专门学向,后简称“格致”。后来从日本借用了“科学”这一译词,才有“科学”这个名称。在 18 世纪,由于近代科学的飞跃发展、科学技术的骄人成就及社会进步和发展对自然诸学科的依赖,使得人们对科学的崇尚达到了顶点,形成了科学主义的思潮,这股思潮是自法国



兴起而后迅速蔓延至整个西方的。其基本内涵是科学是探求真理的唯一模式和途径,是一切知识更新的楷模,同时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唯一力量。从此,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发展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和这一思想的制约,因为用科学的、实证的、逻辑的方法来研究人文现象和社会现象会有许多问题存在,如缺乏可验证性或缺乏严密的逻辑性等。因此,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研究被排除在科学的大门之外,“科学”这一概念遂成了自然科学的专利和代名词。但是,随着20世纪的到来,两次世界大战给人们带来的毁灭性灾难,让人们看到了科学发达的另一面,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所造成的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这促使人们对科学进行反思:难道科学就只是功利性的吗?难道科学的发展与人的生存和人生意义的实现无关吗?就在这时,现象学和解释哲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促使人文意识又一次觉醒。这一次觉醒是以哲学的语言论转向为标志的。但这次觉醒不是以反对神学的形式出现的,而是以反对唯科学主义的形式出现的。人们普遍认为对人类自身的研究与人类社会的研究和自然科学一样,同样是科学,同样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力量。人文科学有自身的独特性,不应该也不可能以自然科学的模式与方法进行研究,它是人类普遍知识中的一个部分,是有着存在的理由和意义的。所以广义科学的概念今天已为人们所普遍接受,而且一个新的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正在国际学术界展开,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正在到来。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人文社会科学的书籍每年出版已占总出版量的三分之二以上。新的理论和学说层出不穷,作为翻译学的研究者至今仍持狭义的科学观点,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套用人文科学的研究,结果得出“死胡同”或“迷梦”的结论已显得很落后和不合时宜了。如果这些人推开窗子看一下,就会感到一阵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热潮扑面而来,而不会再被唯科学主义的迷雾蒙住眼睛了。更何况即使在狭义的科学概念盛行的美国,学者们也并没有把“科学”与“学科”的概念混为一谈,



他们认为人文学也是学科知识体系,同样可以成为独立的学科并开设了许多人文学科的课程,其文学、艺术类的课程并不比任何别的国家开设的少。那么,为什么又有人以“翻译不是科学”为由反对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存在呢?这岂不是很缺乏常识吗?不也说明他们在许多概念认识上的模糊吗?

这里所要谈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理论学习问题。

在前一个阶段的讨论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些论者在理论知识方面的匮乏,其表现主要有二:一是以某人认为翻译学是否成立的观点为准绳。如果西方某“权威”说它是则是,说它否则否,而不是看他说此话的根据是什么。那还要理论干什么?这种唯某人马首是瞻的做法是研究中的大忌,充其量这只能作为论述过程中的一个佐证,而绝不可以作为理论论述的本身。要说明或证明这一问题,应当用相关理论去研究。二是在某些人的论述中经常会出现一些理论常识错误。如有人认为当一个知识体系的主干学科尚未形成时,其分支学科是不可能存在的。而实际上从学科学的理论来看,分支学科和主干学科的关系是不分前后的。分支学科可能比主干学科先出现,也可能后出现,也可能是同时创生。这在学科创生和发展史上都是有先例的,也是有理论依据的。但有些论者对此一无所知,还以为学科发展也同树木一样,没有主干就不可能有分支。这说明以往的一些讨论是不够深入的。要深入下去,就必先从理论学习着手,而且首先应学习学科学的理论。

学科学是20世纪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它是专门以学科作为研究对象的系统知识。它是对学科的定义、分类、结构、模型、形态、特征、更替、衍生、周期、动力、方法、证伪、流派、组织和预测等一般规律进行研究的理论。它对于我们目前所进行的讨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我们讨论问题的理论依据。我们首先应学习和掌握这一理论,让它成为我们关于翻译学讨论的指导。

首先就是要用它关于学科的定义去衡量翻译学可否成为一门



独立学科,然后再用学科创生标准这一指标体系去检验,看它是否已经建立起来。这样以理论为指导,以事实为依据进行讨论才能得出比较令人信服的结论,并避免无谓的争论。

让我们先看一下学科定义。根据学科学规定,凡是一种系统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他的知识系统不同,亦即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工作任务,并能据此而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而这些理论、原则和方法又不是可以被其他学科的理论、原则和方法所取代的,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根据这一定义,我们不难做出这样的判断,翻译学有充足的理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因为它的工作对象和任务是独特的,其理论、原则与方法不是任何其他一个学科的理论、原则和方法可以取代的。尽管它要借用语言学、文艺学和符号学及思维学的理论、原则和方法,但又不是仅从其中任何一个学科借用的,而是经过针对自身的工作任务而进行调整和整合而得来的。其实这也是一切综合性学科的特点,是十分正常的现象。

至于翻译学是不是已经建立起来了,也是争论的一个焦点。这一问题,我们且不说在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在为根兹勒(Edwin Gintzler)所著的《当代理论》(*Contemporary Theories*)一书所写的序言一开头就明言:“The growth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s a separate discipline is a success story of the 1980s.”而且还在其他书中一再声称:“Translation Studies has become firmly established as a serious discipline in its own right.”也许有人会说,这也仅是一家之言。所以我们还是应以学科学是一门新兴学科的创生标准去衡量。一个学科经过孕育、顿悟到创生乃至发展成熟,都是有一定质量检验的指标体系的,各阶段的标准也是不同的。有人以发展成熟的标准去衡量一个刚刚创生的学科也是不科学的。在这方面已有人论述过了(如侯向群同志的“翻译为何不可为‘学’”——见《外语与外语教



学》,2000 :69) ,其创生标准一般包括三个方面 ,即历史条件、理论准备和代表作品及学科带头人队伍。这一方面的详细情况我已在1997年第1期的《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上有所论述 ,在此不想再费唇舌 ,但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是 ,有些人认为我国尚没有令他们信服的代表作品 ,或让他们服膺的代表人物。这也说明不了什么。因为作为一个国际事业 ,如果在我国没有 ,那么在国外也没有吗 ?就以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主编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一套丛书及其他学者如 Roger T. Bell , Theo Hermans , Lawrence Venuti , Albrecht Neubert , James Holmes , Mary Snell-Hornby , Gideon Toury 等人及其著作也不算是吗 ?须知 ,作为一个学科 ,它的建立及发展是人类共同的事业 ,而不是一个国家或民族 ,甚至是几个人的事。有些人目光太狭小 ,仅把目光局限于国内 ,甚至几个人身上 ,他们忘记了这种研究是没有国界限制的。

二、关于翻译学的学科性质与归属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 ,研究者也应放开眼光 ,开拓胸怀 ,不可以用传统的学科划分方法去归属和划分一些新的学科。在学科发展进入第四个时期即系统综合时期以来 ,有些学科就是一种横向的和综合的 ,如生态学或环境科学等。它们涉及众多领域 ,也必须用许多学科的方法去研究。如它们涉及工农业生产、经济管理及城市发展、农村城镇化等多个领域 ,所用知识也涉及物理、化学、生物、生物化学、地理学、经济学、人口学、管理学等众多学科。它们的学科性质就是横向学科 ,“横向”就是其学科属性。而翻译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它涉及领域虽然只是限于信息的传播领域 ,但它所涉及的学科知识却不止一种 ,如巴斯奈特等人说 :“ Translation Studies bring together work in a wide variety of fields , including linguistics , literature , history , anthropology , psychology and

